

# 在後現代語境下我們如何建構醫學模式？——對〈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閱讀

蕭 巍

我一直以為醫學是一種價值建構，儘管從其問世以來，它自身的目標就被嵌入到不同的歷史文化場景之中，始終受到不同的身體、健康和疾病等概念的糾纏，但所有這樣的歷史文化場景和概念，包括醫學本身在內都體現出某種價值追求。這正如美國哲學家希拉蕊·普特南所言，人類依靠概念系統進行的一切智力活動都有價值因素的加入，醫學當然也不能例外。不同的醫學價值理想塑造出不同的醫學模式，人們依據這些模式從事醫學活動，進行醫學管理，把疾病和健康置於不同的文化格局、社會和生命科學技術發展的過程之中，形成紛繁複雜的生命政治體制和結構。

醫學模式經歷過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在 1977 年美國精神病和內科學教授恩格爾提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之前，生物醫學模式一直處於主導地位。這一模式建立在西醫經典理論，尤其是細菌論基礎之上，強調疾病的生物學因素，並據此來解釋、診斷、治療和預防疾病，構建醫療保健制度，主張任何疾病都可以用生物學來解釋，並相應地能在器官、組織和生物大分子層面發現形態、結構和生物指標方面的某種改變。恩格爾的

---

蕭 巍，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北京，郵編：100084。

《中外醫學哲學》XIII:2 (2015 年)：頁 31-34。  
© Copyright 2015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醫學模式把醫學從生物學拓展到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層面，使醫生的目光從僅僅關注臨床實踐，尤其是生物學指標延伸到關注病人，以及他周圍的自然與社會關係環境，尤其是社會醫療保健制度。相比生物醫學模式，恩格爾模式的確是一種進步，然而伴隨著後現代思維的興起，人們愈發地不滿足於這種模式，認為它沒有突出身體和生命的政治含義，只注重病人的權利和情感，忽視醫患關係的秩序和醫生角色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他沒有像福柯那樣敏銳地意識到“醫學是最大的政治”。

時光荏苒，無論是福柯還是恩格爾都似乎與我們漸行漸遠。如何在後現代語境下，基於當代歷史文化、生物科學技術，以及哲學發展建構新的醫學模式已成為一個時代課題。毫無疑問，在這個強調個體權利和自主選擇的時代把紛紛雜雜的權利、生命、倫理、自我、身體、市場、醫患關係和社會醫療保健制度的碎片話語整合起來，形成一種醫學新模式絕非是一件易事，我以為孫慕義教授提出的“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實際上是在進行這樣一種嘗試。

“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像似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立體正方形，以人性為底座和基礎，以身體為軸心，以倫理關係為紐帶和場所，所有的縱橫關係中都貫穿著身體與人性、倫理、文化和生命政治之間的衝突，以及它們之間動態中的平衡。下面我只想就其軸心和場所，即身體和倫理關係談談看法。

20世紀以降是一個“身體回歸”的時代，現象學、後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哲學等理論紛紛對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提出挑戰，梅洛-龐蒂也提出“身體在世”的思想，從身體體驗出發探討知覺與被知覺世界之間的關係，強調向身體的回歸，建構起身體現象學。在物理學和物理世界、生物學和生命存在、自在的客觀存在與生活世界存在之間找到的一條通道。在主張作為一種認識世界方式，現象學與大多數科學解釋和分析思考不同，科學解釋把我們與這一世界的關係還原為物理學和生理學原因起作用的過程，

分析思考則把我們的具體經驗還原成一個虛假的智慧系統。而現象學描述的卻是這個具體的世界。因而，“身體倫理醫學模式”不僅是對醫學現代性、理性和父權制霸權的一種反叛，也是 20 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向“身體回歸”趨向在醫學模式上的反映。當然，這一模式中的身體已不是一個純然的物質實體，以及身心二元論分割中的“身”之一面，而是作為“完整人”的身體，而疾病則是一種與本我“原身”的疏離狀態。

在後現代語境下，從倫理關係出發建構醫學模式也頗具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意蘊。這一文化把所有社會關係都還原成倫理關係，並讓這一關係具有無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張力。“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是融合中西方倫理文化的成果，它所強調的倫理關係突出了以病人為主體的疾病敘事。首先，它強調“聲音”的倫理意義。“聲音是連接內外在世界的一種強有力的心理工具和通道。”“發出一種聲音意味著是人類。有什麼東西要說意味著是一個人。”(吉利根, 1999)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我才相信“身體倫理醫學模式”主張通過讓人“發聲”來突出體驗、感覺、差異和描述的價值，使每一個人都能平等地說話，尊重每一個個體的意識和身份，不再以宏大的敘事和強大的社會機器恃強凌弱。其次，它讓人意識到身體的形而上學尊嚴。人在健康時會從許多身外之物，而不是身體裡找到自己的形而上學尊嚴。而當一個人嚴重患病時，他便失去了一切世俗的光環，被社會機器排斥在外，只能通過身體來獲得某種身份。“我已經充分地領悟到在生命的一些境遇中，我們的身體是我們全部的自我和命運。我生活在我的身體中，此外別無他物……我的身體是我的災難。我的身體是我身體的，以及形而上學的尊嚴。”(Langer 1991, 89)再次，它為改善醫患關係開啟新的大門，要求我們反思以元敘事、理性精神、啟蒙思想和歷史哲學為基礎的現代性知識，建立新型的醫患對話關係，意識到不同個體的健康需求，並通過醫療保健制度為滿足這些需求提供保障。

“醫學是最大的政治”，醫學模式中始終包含著“生命政治”的意義，從學理上說，我更願意把這種“生命政治”視為“生命政治學”(biopolitics)，如果說政治學是關乎民生和人道的科學，其“研究的最高目標應是改善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境況”(王滬寧，1989，3)，那麼無論醫學模式如何變遷，作為一種“生命政治學”，它的最高目標也都應是改善每一位普通患者的健康境況。“極高明而道中庸”，我想這也是孫慕義教授提出“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良苦用心。

## 參考文獻

- 王滬寧：《王滬寧集——比較·超越》，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WANG Huni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Huning* (Harbin: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ress, 1989).
- 〔美〕加里·古廷著，辛言譯：《20世紀法國哲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Gutting, Gary. *20th Century French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XIN Ya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美〕卡羅爾·吉利根著，蕭巍譯：《不同的聲音——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Gilligan, Carol.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XIAO We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9).
- 孫慕義：〈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對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僭越”〉，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2015年，第13卷，第2期，頁9-26。SUN Muyi. “Beyond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Medicine: The Transcendence of Body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ited by FAN Ruiping, 13:2(2015), pp.9-26.
- 張堯均：《隱喻的身體——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6。ZHANG Yaojun. *The Metaphor of the Body: on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Body* (Hangzhou: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2006).
- Langer, Lawrence. *Holocaust Testimonies: The Ruins of Mem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